

威廉·福克纳的南方妇女观

黎明

(渝西学院 外语系,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福克纳关注美国南方妇女,妇女人物在其小说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福克纳在塑造这些妇女形象时,充分表明了他的南方妇女观。

关键词:福克纳;小说;南方妇女观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72-05

福克纳以历史的笔触艺术地描写了美国南方妇女的悲惨命运,对南方妇女作了深层意识的挖掘和精神上的探索,从而表现出他对南方妇女的关怀,也因此而表明了作家的南方妇女观。正如肖明翰所说:“妇女人物在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的艺术观,他对美国南方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都得到充分的体现。”[1]

—

福克纳小说中女性人物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复杂而感人的人性美,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南方妇女的独特理解,这理解中有赞美,又有批判。

“福克纳承认他写书是为了抒发感情,表达自己跟女人的情结,既有美化女性的一面,又有批判女性的另一面”[2]。他认为“女人很了不起,她们比男人强”[3](4页),“描写她们要比写男人有意思得多”,因为“她们很神秘,我对她们了解得很少”[4](45页)。他在小说里审视了南方社会,既通过南方妇女的悲剧批判南方社会,又为她们寻找出路。美国南方妇女无论是在南北战争前还是在南北战争后

都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整个南方社会强调种族、阶级和性别,信奉男尊女卑、白人优越论和庄园主高人一等的思想。南方妇女一方面“被看成谦逊、贞洁、虔诚、自我牺牲等一切美德的化身和家族荣誉及社会声望的代表;另一方面女人又是祸水,是一切罪恶的渊源”[2]。福克纳在直面南方女性生命的描述中,以审美和批判的眼光塑造了一个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南方妇女形象,满怀敬意与怜惜地勾勒了那些被生命所召唤、与传统共鸣的南方女性。《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身上具有不少美德。在康普生那没落、卑琐、冷漠的家族中,凯蒂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是最富有生气、最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对亲人的爱简直就是一面镜子,反照出了她母亲的自私和渎职,尤其是她对小弟弟班吉的关怀和照料更是令人难以忘怀”[5]。“她追求知识,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反抗精神”,坚持“男孩子干什么,她也干什么”[2]。作家称赞她在爱情上的热烈,她的反抗精神、她的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和思想解放的观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纯洁高傲的南方淑女却终于走向极端,沦落风尘。福克纳成功地塑造了凯蒂这个既是圣母又是淫妇、既叫人消魂荡魄又让人伤心绝望的女性形象,着力倾诉了自己内心深处对

收稿日期:2002-01-09

作者简介:黎明(1964—),男,重庆永川人,渝西学院外语系讲师。

女人的思想感情。他美化凯蒂,又批判她心灰意冷“像死了一样”[6](14页),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承认自己是邪恶的,并开始自暴自弃,走上堕落的道路。福克纳最后不得不发出哀叹:“她不需要别人的拯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的了。”[6](366页)。在作者看来,女性的文化形象和行为规范是谦逊和顺从。贞洁、名誉这些观念,通过使女性依赖所处的社群所容许的存活方式而产生并维持,从上、从外强加于她们的抽象的贞洁和名誉,内化后却成为她们的责任,是她们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是她们确立自我的途径。凯蒂虽然是被社会所毁,是社会摧残妇女的象征,但她个人的两难、挣扎、抉择的空间仍然是存在的。

凯蒂这个“美丽而不幸”的形象被毁坏后,福克纳把希望寄托在《喧哗与骚动》中的另一位妇女迪尔西身上,希望她“既是女人的榜样又是南方的未来”,因为“迪尔西信仰并身体力行基督教所颂扬的博爱与同情精神”[2]。她顽强地维持着日益败落的康普生家族,细心地照料和关心白痴儿班吉。她虽然是个黑人妇女,却具备福克纳所赞赏的那种曾在凯蒂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大胆、宽宏大量、温柔和诚实”[7](224页)的品德。福克纳在谈到《喧哗与骚动》中的黑人女仆时曾说:“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柔、诚实”[8](456页)。作家在最后描写迪尔西带着女儿和小外孙赴黑人教堂参加宗教仪式时,对教堂里的宗教仪式进行了细腻而深入的描写,象征着涤罪与净化的宗教活动“升华”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可以说迪尔西出淤泥而不染,显见其高洁、纯真;历经艰难曲折而不摧,显见其刚强、坚毅;面对康氏家族的没落,始终保持纯朴、善良、真诚的本色。

福克纳对南方妇道观的批判是深刻的。“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福克纳,自然对这种以清教主义为核心、服务于种族主义、违反人性、摧残妇女的妇道观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对其进行暴露和批判。”[1]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福克纳用半谴责、半惋惜的笔调,精心塑造了爱米丽的形象。福克纳赞扬爱米丽作为南方女人敢于担当风险、战胜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忠于爱情,认为爱米丽身上的人性美和个性美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勇气正是作者所歌颂和欣赏的人类品质,是人类战胜苦难、走向永恒

的基础。然而由于爱米丽生活在南方,更生活在特定年代,这就决定了她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女人,因此,“在她心灵深处始终受到一个枷锁——南方旧传统道德的控制”[9],从而使她在精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弃妇的悲惨命运与性的极度压抑使她的性格心理逐渐发生了扭曲畸变,最终使她变成了一朵“浸润着毒计的罂粟花”。这使“她的内心永远失去宁静,精神上永远背上一个巨大的包袱,她的灵魂永远处于被拷问、被斥责的地位”[9]。像爱米丽这样“勇敢、不屈不挠”的南方妇女最终也没有逃脱南方对她的影响,更没有超越南方的道德给南方妇女的种种精神束缚。福克纳借此历史地批判了南方妇女“反抗精神”的不彻底性,以及南方社会摧残妇女的残酷性。《圣殿》中的“纯洁女人”坦普尔,“是受南方妇道观摧残的妇女的又一个典型,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她来对南方妇道观念进行批判”[1]。

二

在福克纳的小说文本里,女性角色的鲜明身份与他对方南方妇女命运的哲理追问交融在一起。人类普遍的精神性要求具体指认为女性要求,从而使痛苦自然而然地从女性意识深层次浮现出来,而福克纳正是将痛苦作为探求南方甚至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特殊艺术视角。

福克纳如此关注女人的痛苦,不能不说是他寻找女性本相、正视女性内心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关注焦点。他使女性个体带有特殊性的痛苦体验升华为南方妇女群体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普遍处境。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洛莎是家庭与环境的牺牲品。作者“对她和与她相似的南方妇女倾注了极大的同情”[1]。在《喧哗与骚动》中,作者以血和泪的控诉,倾吐了他对南方妇女的同情和怜悯,以此表达他对南方社会对女人的偏见和歧视的愤怒控诉。家族的冷漠无情、家人的逼迫和压力造成凯蒂内心的极端孤独。本来,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的反抗乃至敌视是孤独感的源头,而在福克纳的这部小说中,孤独不仅是生存氛围、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生存根源、生存态度。正是由于凯蒂内心的孤独,才导致了她与社会的分歧和家庭的决裂。“离家出走”实际上是一种女性的“逃离意识”,社会规范和男性中心迫使

逃离成为女性的精神特质和心灵指向。逃离是因为孤独的女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她们无可奈何地走在这条无止境的奔逃路上,内心深处依然抱存希望,希望在这别无选择的选择之后,能够逃离现实的黑暗压抑,走向澄明与自由,从而获得超越现实的希望与精神上的寄托。福克纳让女主人公凯蒂在命运长河里漂流,在人生奔逃中做各种不同的突围与搏击,遭受心灵的创伤。于是痛楚化成一面观照美国南方历史的镜子,在沉淀于美国南方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牢牢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孕育生的欲望。

福克纳的南方妇女形象,深度地抵达了作为历史与社会无意识的女性经验,深刻地传导出美国南方妇女在痛苦、失望与孤独时那种在传统废墟上飘荡的沉重而无声的呐喊,那种心灵的凄怆柔情。福克纳努力地表现如爱米丽、艾迪等一系列南方妇女身上存在着的不仅是个人和自我(灵和肉)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人和环境之间的冲突,女人作为南方女人之间的冲突,以此表现“人类心灵与心灵自身的冲突”这一难题,认为“只有这样的心灵方能写出好的作品,因为只有那个才值得一写,值得人涌起痛苦和甜蜜的感情”[10]。“只有当他转向那块土地(甚至不是全部的密西西比,而只是密西西比北部他住所附近的丘陵地带)时,他才开始显示出使他成为本世纪南方的、全国的最著名小说家的力量”[10]。福克纳那个“穷尽一生也无法把它写完”[11]的南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南方妇女没有身份、没有自我、更没有权利,她们只能作男人的妻子、情人、仆从,唯男人是听,作男人的驯服之马。尽管表面上男人们保护女人,对她们彬彬有礼,实际上妇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福克纳不仅以作家敏感的笔触深入触及南方妇女的生存境遇,而且以女性视角对人类存在进行审视,其小说就超越了一般塑造妇女形象的小说而上升为对南方整个存在的关注,并对整体(包括人类的存在和命运)提出质疑。这种对南方妇女的关注、怜悯又是何等的一种“大情怀”!

作者以悲愤的笔调描写的爱米丽是一个敢于冲破世俗偏见,为爱情而奋不顾身,有着“女人性格”的南方女人,然而这个南方女人在婚姻问题上最终不能“蔑视一切成规陋习,放弃荷默去大胆追求新的幸福”[9],她竟“愚昧”地认为自己“罪大恶极,

整日洗心革面,决定用余生的时间来忏悔自己的罪过,用骇人的行为来惩罚自己”[9]。福克纳对爱米丽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我认为怜悯他人不应该仅仅因为怜悯者或被怜悯者会因此感到高兴或满意。应该怜悯的是一个人竭力违背自己的本性,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才是应该得到怜悯的。怜悯不应该针对个人的情况,它是一个人自己的心,与他的同伴,与他的环境相冲突的情况。……应该得到怜悯的是当一个人怀着愿望和冲动,尽最大的努力去和自己的道德良心作斗争,和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良知作斗争”[3](58—59页)。爱米丽是“传统”和“法则”的牺牲品,这些“传统”和“法则”彻底毁了爱米丽的一生。正如肖明翰所说:“南方妇道观(southern womanhood)是爱米丽悲剧的真正原因”[12]。这使人想起鲁迅说的“礼教吃人”来,美国“南方的道德”也是疯狂“吃人”的。如果说凯蒂、爱米丽、艾迪的悲剧人生是作者对南方妇女的同情和怜悯,它更是作者对南方传统的愤怒控诉。“他不自觉的在每一行、每一个短语里都写进了自己的强烈的绝望、强烈的愤慨和强烈的沮丧以及对更为强烈的希望的强烈的预言”[13](24-25页)。

三

福克纳一方面对南方传统中的清教主义、南方妇道观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情系旧传统,为传统美德的沦丧感到痛心疾首。

在福克纳塑造的众多妇女形象中,只有迪尔西最符合他对妇女的要求。从迪尔西可以看出“福克纳妇女观的核心就在于女人要安分守己,为男人服务”[2]。白痴班吉的嚎陶大哭阻挠了凯蒂的成长,这种无意识的本能正好符合南方社会要求女人为男人和传统作出牺牲的习俗。在南方这个男权社会里,实行的是男权秩序,拥有的是男权文化。女人的内部世界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往往受到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的压迫,同时被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扭曲自身。南方女人似乎永远陷入无比尴尬的困境:她们既不能超越自我,更不能超越传统,也不能简单的回归。她们只能被外部世界箝制。外部世界的变化、压迫是女性内部世界改变或压抑的根源。无论她们离开男人或是依附男人,南方妇女的命运都将是接受男人的控制或指引。美国南方这个男权

社会包办了整个女性的成长。南方女性，“随着战争的开始，在社会的刻意塑造下，她们身上的女姓人格不断受挤压而南方人格却得到不断加强”[9]。南方女人从进入社会生活的第一天起，这个南方人格就伴随着她们，直到生命的结束[14]（1528页）。因此，“在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她们必须得经历一系列男人所没有的‘灵与肉’的巨大精神考验，在寻求作为女人的自我意识和作为南方人的集团意识之间进行小心谨慎的选择，在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在父兄允许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美丽的梦想和追求幸福的理想”[9]。爱米丽被父辈的传统教化吞噬了青春而变成了一个冷漠、孤傲的老处女。她对荷默的爱受到了南方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因为“在人们的眼里她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渴望并有权利过正常生活的女人，而是一座纪念碑，是过去时代的象征，体现着他们的传统、义务、责任。在这样的家庭和传统势力的控制之下，爱米丽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毁灭了”[1]。她最终经不住小镇市民的纷纷议论甚至诽谤，用杀死荷默的办法斩断了爱情，以此维护南方的传统。爱米丽最终没有嫁给北方佬这种“守节”的表现，是一个南方女人应尽的“义务”，因此，这可怜的女人又成了“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而被南方人“献上一朵玫瑰”！福克纳以此表达了他对南方妇女境遇的深深同情。作家努力写出了南方妇女在传统与自我这个夹缝中挣扎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南方妇女在寻找自己最后的归宿、寻找自己的精神方舟时，是无法与旧的南方传统和道德分开的，传统、妇道将统一她们的人生。南方的社会规范和男性中心要求妇女安分守己，为男人、为传统服务，这使南方妇女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一种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之地，从而使南方妇女的一生充满艰辛与创伤。在南方，传统、道德、规范、秩序……一切以男性中心为原则的范畴，都是强加于女人之上或者说潜入女性或公开或悄悄地维

持效用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当南方妇女在此体系的强压下被迫接受不平等不自由时，她们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反叛传统的要求。《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在失望、被欺骗和痛恨中，开始了反叛的行动。她学会了欺骗，欺骗生活、欺骗安斯、欺骗镇上的人、也欺骗自己。为寻找真正的爱情，她做了牧师惠特菲尔德的情妇，可是懦弱虚伪的惠特菲尔德却并未带给她渴望已久的爱情和真情。这给她心灵的创伤是极大的。因此，“她无法说服自己按照南方的道德标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来约束自己，像她的邻居科拉那样安分地去忍受一切。她不愿忍受”[9]。艾迪由此鄙视和痛恨丈夫，并以死后葬于自己娘家来表达她与丈夫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然而，作为强大男权统治下的一位弱女子，她的反叛只能达到这个地步，这种反叛是无效的，最终“她并不敢公开否认自己的思想和报复行为，她不敢提出离婚。和大多数不幸妇女一样，她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和煎熬”[9]。人的生命的压抑与窒息，人与人之间恶毒扭曲的关系扑灭了女人的生命之火，女人最终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福克纳再次宣告了他的南方妇女观，这宣告是痛苦而悲惨的！它“始终隐含着一种召唤，隐含着心灵对于迷途与归宿的告白——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生活，而是生活拒绝开启的潜能。在那里，死去的肉体冷漠而且丑陋，处在挣扎、愚蠢、疯狂和喜剧的反常之中”[15]。

“福克纳在小说里写进了自己作为男人对各种女人（母亲、情人、女儿）的看法”[2]。其实，在他塑造的南方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让女人真正融入了南方，融入了人类历史。

参考文献：

- [1]肖明翰.试论福克纳笔下的妇女形象[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 [2]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J].外国文学评论,1992,(4).
- [3]约瑟夫·布洛特纳·威廉·福克纳:生活与艺术[M].转引自:多琳·福勒,安·艾勃第.福克纳与女人[M].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6.
- [4]弗雷德里克·格温,约瑟夫·布洛特纳.福克纳在大学[M].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

- [5]张先昂. 美国南方的悲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 (6).
- [6]福克纳. 喧嚣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7]梅里韦瑟, 米尔普特. 园中之狮[M]. 内布拉斯加: 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68.
- [8]朱雯. 外国文学新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9]魏玉杰. 上帝与撒旦的冲突——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主题分析[J]. 国外文学, 1998, (4).
- [10]James B. Meriwether. Essays Speech & Public Letters by William Faulkn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7. 转引自(美)威廉·莫斯. 福克纳论文学的主体与客体[J]. 刘莉莉译. 外国文学评论, 1998, (2).
- [11]Jean Stei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J]. Paris Review (Spring 1965): 28 - 82. Rptd, in William Faulkner: 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 Frederick J. Hoffman and Olga Vicke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3.
- [12]肖明翰. 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
- [13]福克纳. 喧嚣与骚动·序言[A]. 转引自里查德·勃洛德赫德. 福克纳: 新的见解[M]. 美国: 普伦特斯——霍尔出版社, 1983.
- [14]查尔斯·威尔逊, 威廉·弗里斯. 南方文化百科全书[M]. 美国: 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1990. 转引自魏玉杰. 上帝与撒旦的冲突——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主题分析[J]. 国外文学, 1998, (4).
- [15]许志强. 《我弥留之际》的一个评注[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 (2).

William Faulkner's Southern Women Viewpoint

LI M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West Chongqing College,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8, China)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women of southern states. The women figures hol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 novels. Faulkner manifests his southern women viewpoint in creating these women figures.

Key words: Faulkner; novel; southern women viewpoint

[责任编辑:张思武]